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1980年年会论文选

(考古学分册)

1981年2月

前 言

江苏省考古学会于1980年9月成立。三十年来,江苏省的考古工作不仅调查、发掘了江苏地区多处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和墓葬,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而且通过调查发掘,进行了科学研究,写出了具有一定价值的考古报告和论文。它对我国古代历史和有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科学论述。

这次成立大会收到的学术论文和报告材料共计48篇,其中5篇已在《江苏社联通讯》上发表,11篇选用在《南京博物院集刊》、《文博通讯》和其他刊物上,3篇推荐给中国考古学会1980年年会。由于篇幅有限,不再将上述各篇在此论文选上采用,仅将全部论文的目录刊出。本集论文,因印刷条件等原因,在编辑时作了适当压缩,去掉了注释与图版,特此说明。

目 录

楚被广陵·····	朱 江 (1)
略论汉代楚国(彭城国)·····	张祖彦 (7)
试谈汉画像石起源·····	王黎琳 (10)
江苏徐州的崖墓·····	武立华 (14)
澄湖形成的原因和年代问题·····	张志新 (17)
连云港市出土的汉唐木俑·····	周锦屏 刘洪石 (21)
连云港将军崖岩画的初步考订·····	李洪甫 (23)
关于苏州地区及长江三角洲南部的成陆时限问题·····	诸汉文 (26)
从坊市遗址出土文物看宋代苏州城市经济发展·····	廖志豪 (30)
江南古城堡——淹城·····	徐伯元 (34)
睢宁双沟东汉画像石刻《农耕图》的剖析·····	尤振尧 (37)
溧水神仙洞发现的一万年前陶片·····	葛治功 (41)
从矢殷铭文谈太伯仲雍奔吴·····	陆九皋 (45)
吴国中部吴城考·····	刘建国 (50)
丹徒县高资的人类股骨化石·····	严飞 时裕承 戴志恭 (53)
试论石斧石锛的按柄·····	肖梦龙 (55)
从两件出土文物谈我国古代的铆接工艺·····	吴大林 (57)
海陵多麋初探·····	刘 华 (59)
东汉末三国初的北人南徙·····	易家胜 (61)
“中石器时代”质疑·····	张之恒 (63)
南方唐墓初探·····	秦 浩 (68)
六朝陵墓石刻艺术渊源初探·····	管玉春 (75)
昆山盛庄青铜器溶铸遗址考察·····	陈兆弘 (77)
从出土动物化石看邳县地区古代气候及地貌·····	陈永清 (80)

楚被广陵

朱 江

关于“楚”的问题，按照通常的解释，“楚”系古国名称，始祖鬻熊，姓芈，原是商朝的与国。到西周时，立国于荆山一带，虽臣服于周，但也常和周人打仗。周人称之为“荆蛮”，楚人亦自谓：“我蛮夷也。”自熊渠起，疆土扩大到江汉之间，后又都于郢（今湖北江陵地区）。春秋时代，楚兼并周围小国，其势力达到昭关（今安徽含山）一带。与吴交界。战国之际，一举灭越，尽取吴故地。后在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阴），又于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直至哀王五年（前223）为秦所灭。若以楚自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算起，立国几近九百年。若自熊渠自立算起，王三十五人，地广五千余里，东极于海。这是我国先秦时期，立国最长，被及最广的诸王国之一。因之，楚文化的研究，对于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先秦时期文化的探讨，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至于扬州和楚文化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扬州在春秋时期属吴国，名邗城。在战国之际属楚。楚怀王十年（前319）于邗故址筑城，名广陵。直至秦汉以后若干年，广陵一名，延用未衰。可见楚对于先秦时期的广陵，影响之深远了。

我们要探讨楚文化东被广陵的问题，得首先弄清以下几个点，即：

- 一、先吴时期长江河口地段的文化归属；
- 二、先楚时期长江河口地段的文化归属；
- 三、楚文化被及广陵时期的状况。

先来谈第一点。

在吴王夫差十年（前486）“城邗”之前，广陵地属古“邗”国。关于“邗国”的历史，史已绝书。只在一些辞书中，有些释注。大都引自《说文》与《通训定声》等字学文笈。关于古邗国的方位，《说文》释为：“今属临淮，一曰本属吴。”《通训定声》注为：“今江苏扬州 废江都县，古邗城地也。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说文》和《通训定声》中所释注的“邗”，虽在一些辞书里，系在“古国名”下。但在这些释注中的“邗”，实际上，仍然是指的《左传》中的“吴城邗”，至于“吴城邗”的问题，似应解释为“吴城（于）邗。”这句话的意思，即是吴王夫差于鲁哀公九年（前486）在邗国的地方筑了一座城，因名“邗城”。又在城下凿了一条河道，以此来沟通长江和淮河，因名“邗沟。”由此可见，“邗”在“吴城”之前，就已存在了。据南京博物院梁白泉同志语我，彼曾在《燕京学报》上，见到过出自邗国的青铜器图录与论文。如果这件青铜器确属邗国重器，其年代又比“吴城邗”为早，那到是一件值得予以足够重视的历史信物。出于以上种种因由，我认为扬州的历史，应当有个“先吴时期”，即古邗国的存在。至于早到什么时候？其上限还没有什么依据能够说明。其下限是很清楚的，

即是晚到“吴城邗”之前。所谓“吴城邗”，实际上是吴灭掉了邗国而后城于邗的。至于邗国的疆域有多大？这和当时的历史现实与地理状况结合起来看，扬州在整个上古时期，处在长江河口与淮河河口之间的蜀冈地带。北受淮水，南受长江，东受大海所限，不可能有博大的地域。再说当时的历史现实，一城一邑，都可称做国。因之，古代邗国，未必大到北圻于淮，东极于海的程度，很可能是个僻处江滨，与虞、虢、唐、随相类的小国。当时，在邗之西不远，有棠邑；在邗之对江，有朱方，也说明邗国是个疆域不大的小国。至于邗是个什么性质的国家？以顾颉刚先生等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图》为依据，夏代此地无考，商人势力虽已逾淮，尚未达到此地。到了西周，才入周王版图，但无邗的系事。这段历史状况，与近三十年来的考古学发现到也相似。例如，在邗城遗址以西约25公里的破山口，曾经发现过一座以大量青铜器随葬的西周时代的土坑墓，墓主人显然是个贵族。并且在扬州对江的丹徒烟墩山，也发现了西周成王时期宜侯的土坑墓，出土有大批青铜器。足见周人势力，已经跨过长江，达于南北两岸。既然邗已列在周王版图之内，必然是个臣属于周，或者是臣服于周的方国。再从破山口出土的一件铜鼎残片上铭文：“子作父宝尊”判断，极似商代的青铜鼎。商人的势力，也似乎到达了长江下游的北岸。这时，如果邗已存在的话，那末，邗国该是个臣属或臣服于商的方国。至于邗国的土著族属的问题，这只能从邗国的先民族属中去寻根究源。据历代文献记载，先秦时期的广陵，地在淮夷部族的范围，另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认识，扬州方言，属在淮扬语系。若与江苏南部茅山以东的吴语方言来比较，是一种与吴语截然不同的语系。它与鲁豫方言，也有着明显的差别。再说这个语系的分布情况，大体上是和淮夷部族分布的地域相似的。

现在再来探讨一下与邗国相邻的朱方与棠邑的问题。

“朱方”，地处长江下游河口地段的南岸。它的具体方位，据《丹徒县志》引《罗泌路史》云：“润之丹徒东二十里曰朱方。”我国史学家对“方”的解释，有的释为“方国”，有的释为“部落”。那末，在先吴时期，朱方是个部落，还是方国呢？这个问题，虽属还没有足够的史料能够把它敲定下来，但是，可以认为朱方是早于姬姓吴人，就在这里休养生息的居民。

至于此地叫不叫朱方的问题？据《前汉书·地理志·丹徒》下注：“（颜）师古曰，即春秋云朱方也。”《后汉书·郡国志·丹徒》下注：“春秋曰朱方。”再据《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徐祭三年》条记载：“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宋中郎外兵曹参军裴驷案：“吴地记曰朱方，秦改曰丹徒。”可是，尚未把“朱方”和“丹徒”之间的内在联系讲出来。我们现在已了解，此地成王之际，称做“宜”，成王不仅把宜的土地分封给了矢，而且把宜地的王人，也一齐作为奴隶封给了矢。周代的奴隶，尚不能确知其穿什么衣服？但可以知道，秦汉时期的囚徒，是穿一种以赤褐色衣服为标志的。那么，在先秦时期的囚徒或奴隶，是否也是穿一种以赤褐色衣服为标志的赭衣之徒呢？也不无有些渊源关系吧！在我国古代文字中，“朱”作“赤”讲，“赤”即是“红”的意思，“丹”亦作“赤”讲，也即是“红”的意思。“赭”字从“赤”，“赤者”，赭也，它与“朱”与“丹”原意相近相似，都是源于赤。因此说，“赭衣徒”与“丹徒”是一个意思。很可能这两个名词的词源，都是源于“朱方”。可见“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这段话的意思，即吴王徐祭也像成王姬诵一样，把原先的宜地，连同人民，一同赐给

庆封作为奉邑了。这个奉邑，就在今天镇江东南十八里的丹徒镇附近，也即是宜侯矢钊出土的地域，这不能说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应当看作是“朱方”与“丹徒”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先后关系。由此可知，在先吴时期，朱方即已存在了。如果我们把“方”字作为“部落”来解释，这与成王时期宜地土著的历史状况，似乎还是符合实际的。如果把“方”字作“方国”来解释，倒反而没有确实的依据来证明它的存在。但可以说，在成王之际，既然“矢”已经“侯”于“宜”了，这里也必然是一个“万方万邦”的方国。所以有人又把称做“朱方邑”。后到吴王余祭时，又有人称它为“朱方之县”，这为汉代的“丹徒县”，无疑开了先河。那么，朱方既然早先并不为吴国所有，它就必然有其自身的族属。前人一概把江南地区称做“荆蛮”，也未必合乎史实。但从人文科学的资料可以看出，先吴时期的朱方和邗国，可能都是源于淮夷族人的后代。

再说“棠邑”，它在先吴时期，曾属于楚，这是它和邗国与朱方的不同点。据《六合县志·地理志》记载：“棠之为邑，则早著于春秋传。……襄公十四年（前559），楚子为庸浦之役故，子囊师于棠以伐吴。此棠之初见也。昭公二十年（前522）有棠君尚。杜氏注，伍尚为棠邑大夫，则棠之属楚可知。《史记·刺客列传》有：专诸，吴棠邑人，则棠邑又属吴可知。后吴王夫差城邗，沟通江淮，去棠甚近，盖棠在江北淮南，春秋之末，处吴楚疆场之交，为战伐必争之要害，地势使之然矣”。由此可见，棠邑和楚的关系。不仅先于邗国与朱方，而且深于邗国与朱方。春秋时期已有棠邑，这就说明，棠邑这个名称的出现，是可能早于春秋的。也就是说，棠的存在，也应当有一个先楚时期。先楚时期的“棠邑”，是个什么样子，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史料能说明这一点。不过，这从南京博物院尹焕章先生所做的“仪（征）六（合）地区的湖熟文化遗址的调查”得知，仅今六合县以西十五里的羊角山遗址一处，其面积就达12.000平方米之广。出土有大量的外饰绳纹、弦纹、编织纹的夹砂粗红陶鼎、鬲、甗、罐和灰红陶鼎、豆、罐等遗物，据尹先生的推测，是一处约当我国奴隶制时期，即商至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处在这个时期的“棠邑”居民，当是当地的土著。至于他们的族属，仍应是淮夷的一支。

先吴时期的棠邑故城，据《六合县志·古迹》记载，在今六合县北。属在蜀岗丘陵地带。与这些文化遗址地点相邻。

现把上面述及的三个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推究，不难得出这样的印象，以上粗略的情况，就是吴楚之前广陵及其附近地区的历史梗概。

再来谈谈第二点。

吴自寿梦强大以后，不断向西向北扩张。吴和楚的第一次接触，是在周简王元年，即吴寿梦元年（前585）“朝周适楚”，与鲁成公会于“鍾离。”吴与楚历年征伐，虽互有进退，但到吴王僚九年，即楚平王十一年（前518），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鍾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鍾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鍾离、居巢。楚乃恐而城郢。”从此以后，吴与楚的交界，常在淮水以南的鍾离、巢、舒、六、潜一带移动。当然，处在鍾离、六潜以东以南的楚之棠邑，入吴国版图，这也是“地势使之然也”的事情。

关于楚国势力，在吴楚时期，是否到过江南吴地的问题，文献没有明白说过。但从以

下几点判断,楚人不仅可能,而且确曾到过江南吴地。如:

(一) 吴寿梦十六年(前570),楚子重伐吴,克吴鸠兹。鸠兹,在今皖南芜湖县以东。此次,楚师不仅过了江,而且深入吴地四十里。

(二) 吴王余祭十二年(——536),楚灵王会诸侯伐吴,围朱方,诛庆封。朱方,即前述之丹徒。此次楚师不仅过了江,而且到了吴的北鄙。

关于吴楚早期江上通道的问题,从《春秋》、《史记》和《吴越春秋》、《越绝书》《吴地记》等文献来推测,其主要通道,大体上有以下两处:

一是在鸠兹与昭关之间,即在今安徽芜湖长江地段。在江之左,有青弋江与长江相连;江之右,有裕溪与长江汇合。稍北一点,有两山夹岸。在江之左,为东梁山;在江之右,为西梁山。不仅有稳定的江岸,而且江面狭窄,是一处理想的渡口。相传到了吴王阖闾与楚昭王时期,吴人东起太湖的木浦,经今东酒、宜兴、团酒、西酒、徐舍、南河、溧阳、东渡、河口、定埠、胥河、固城镇、入固城湖,再经牛儿港,水阳镇入水阳江,西达长江,凿了一条人工运河——胥溪,曾为公元前506年吴人大举伐楚,遂入于郢都的一条西向通道。

“胥溪”所在的沿线,应是吴楚早期一条主要的通道,也是一条理想的通道。

二是在邗城与朱方之间,即在今江苏扬州与镇江地区的长江河口地段。由于处在河口地段的邗城与朱方之间的江面太为宽阔,其具体地点,先似在今扬州地区仪征县“胥浦”与江南下蜀之间,后又筑“邗沟”,作为北上淮泗的一条主要通道。

“胥浦”和“胥溪”相传都与楚人伍胥有关。“胥溪”,传为伍胥入吴以后开凿的人工运河。“胥浦”,传为伍胥奔吴时的“渡江处”,载在地方志内。

这条通道,是否早在西周时,矢入于宜,是否由此而南的?另在楚围吴之朱方,是否也是由此而南的?吴人伐徐,取善道(在今江苏盱眙境),是否也由此北向的?当然,时至吴王夫差北上伐齐,吴人渡江而北,舟循邗沟,军于淮泗,盟会黄池,无可疑问,是以此作为主要通道的。由此可见,楚之棠邑,成为吴之干城,亦当在这前后。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一点,即在吴楚早期,或之前,长江并非诸侯或部落的疆界,既互有进,又互有退。因之,棠、邗与朱方均曾受到楚人影响。虽属在吴城邗前后,未曾说及楚对邗的影响。但可以想像而知,当强楚邑于棠时,吴人势力尚不能及于邗,邗必然要胁于楚。吴既城邗,棠也随之地入于吴了。可见邗、棠之间,也如虞、虢一般,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直到越亡于楚,楚尽取吴故地,棠与邗,地皆入于楚国版图。

最后来谈第三点:

通过先吴,先楚时期广陵及其附近地区历史的剖析,对于我们认识楚文化东被广陵地区的状况,不仅是个需要,而且还会有所补益。首先,我们不难从中看到,广陵及其附近地区,在春秋之前,既不属吴,也不属楚,而是有着各自的发展史。其次,我们还能从中看到,楚文化对于广陵及其附近地区的影响,不仅有远于吴的记载,即便在地入于吴的同时,由于所处的地位所使然,也还不断与楚人有所接触。后自楚威王(前339至329)兴兵败越,杀越无疆,尽取越地起,历时一百二十年左右,地属于楚。又自楚怀王十年(前319),于蜀岗之上筑广陵城起,至秦二世二年(前207)召平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时止,是广陵故城尚在的明证。这也证明广陵和楚的关系,比和吴的关系,还要长远。现就广陵地入于楚以后的文化遗迹与遗物,谈谈楚文化东被广陵的一些状况。

关于楚在广陵的文化遗迹,博大不过于楚怀王十年在蜀岗上筑的广陵城了。这条历史信息,载在《史记·六国表》内。至于楚广陵遗存的发现,在《邗城遗址与邗沟流经区域文化遗存的发现》(1973年12期《文物》47页)中,有下一段说法:“从《汉书》的记载以及地面调查得知:公元前319年,楚怀王(熊槐)城广陵,此楚之广陵即吴之邗城。”

另在《扬州古城址变迁初探》(1979年9期《文物》48页)中也说:

“《读史方舆纪要》卷23云:“广陵城在府城东北,楚旧县。《史记表》怀王十年城广陵,秦因之。二世二年广陵人召平为陈王徇广陵是也。”从这些文献的记述来看,吴邗城,楚广陵城和吴王濞城的地理位置均应是一个地方。证之考古遗迹,亦大体上是可信的。

既然文献和考古学资料都说:“楚之广陵即吴之邗城。”换言之,这座城的遗址,“就在蜀岗的尾间上面,断垣残迹,犹遗地表。”从地表遗迹得知,这座城的规模,版筑土垣的残迹,“东至象鼻桥,西止观音山,南止梁家楼子,北迄尹家桥头。”城垣计有两道,外城和内城之间,夹有城濠。据《嘉靖惟扬志·城池》内载,“广陵金城,即楚子外城。”“楚子城”也即是“《史记》(所说)楚王熊槐尝城广陵”的广陵城。周长约在五公里左右。

除去以上所说的楚广陵城址而外,还于1972年底,在今邗江县西湖公社胡场大队前庄生产队的地域内,发现过一座战国时代的楚墓,墓为土坑木棺葬,出土有山字纹铜镜和铜戈,铜剑,以及玉环、璧、珥和一些漆器,并有铜蚁鼻钱伴出。这座墓葬的出土地点,在楚广陵城址的西北,约7里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它是在楚广陵城的领地以内的一座墓葬。

关于楚在广陵的文化遗物,虽属仅限于饼金和漆器等类,但和楚在广陵的遗迹结合起来看,到还是相得益彰的。例如在楚广陵城址以内,就曾于今堡城大队的许巷与钱庄的田地里,先后出土过“郢爰”三块,一重7克,一重2.5克,一重1.8克。这说明遗址和遗物的内在联系,也是完全一致的。

据今所知,以往在今江苏的高淳、句容、丹阳、沛县、盱眙、宝应,以及仪征县龙河公社的赵庄、补席公社的张庄和邗江县汉河公社的下庄等地的田野或水塘里,陆续有楚国金币出土。特别是今仪征和邗江县境又都是地在楚广陵地界的,这些货币的出土,足以证明楚国文化的被及,这完全是与当时的历史状况相合的。

另在楚广陵地域内出土的文物中,最能说明和楚文化汲汲相关的遗物,那就要数到战国时代的漆器了。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那件漆盘,与《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上的漆盘纹饰相似(见1956年5期《文物参考资料,江都凤凰河东岸出土战国时代漆器》)。另在1972年于西湖公社发现的那座战国墓中,也出土了二件与之相类似的漆盘。其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以夹纆作胎,底色髹以深褐色漆,花纹用朱红色漆绘制。至于其笔锋之流丽,布局之匀称,结构之灵活,两者则是一致的。

关于楚文化的风格与特点的问题,我在《试述几何印纹硬陶与青釉瓷文化遗存的源流》(1977年7期《扬州师院学报》74页)中说过以下一段话,即:

“近年在武进和丹阳等地出土的青釉瓷甗等器皿,不仅造形一如铜器,而且遍体满布那种类似屈曲而又尖出的丁文,与淹城出土的那组铜器上的繁褥细密的纹饰,几乎完全相似。”

这种以“繁褥细密”为特征,以“屈曲而又尖出的丁文”为特点的纹饰,是楚文化的

铜器中，具有代表性的风格。不仅在江陵楚人立国的郢都出物中如此，而且在随县曾侯乙墓里出土文物上的纹饰，也是如此。当楚“尽取吴故地”以后，吴文化就很快被楚文化代替了，淹城出土的那批与镰刀共存铜器群的形制与纹饰的风格，不仅和“吴器”有一定的差异之处，而且不同于至今发现甚少的“越器”，相反和“楚器”相当相似，这不能不是楚文化东被吴越的一个侧面。虽说广陵地区至今尚未有与武进、丹阳等地出土物相类似“楚器”发现，但可以相信，这不过是时日的问题。例如，既能于1965与1974年间在古棠邑境内（今六合程驾桥），先后发现两座据认为是“春秋末期”的“贵族”墓葬，出土了一批与寿县蔡侯墓铜器风格相近似的青铜器，我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在广陵地区将会有“楚器”发现或出土。这才能与楚城广陵，秦因之为县的历史状况相称。不然的话，楚城广陵的意义，也就不大了。既然楚如此重视广陵，而又视广陵重于棠邑和“朱方之县”，广陵自有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这必然是和南北通道有着关联。楚城广陵，必将有贵者守邑于此。既有贵者，自会有青铜重器存在。再说楚文化的被及，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里，也必然会蔚为风气，这才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

南京博物院集刊

第一集 目录

中国画的章法布局·····	鲍汉青
试论佛教寺院艺术·····	梁白泉
明代后期敢于独创的苏州画家李士达和袁尚统·····	马鸿曾
试谈刘裕·····	顾征祥
中日友好与鉴真和尚·····	魏采苹
宋江历史结局问题新证·····	顾文璧
留虎遗患	
——徐少遽团练对太平天国革命的破坏·····	庄群
江苏泗洪曹庄新出东汉画像石刻诠释·····	尤振尧
六朝陵墓及其石刻·····	罗宗真
浙江东阳卢宅·····	戚德耀 叶菊华
南京北城外发现太平天国铜炮和防地遗迹·····	王少华
博物馆的科研性质和科研工作·····	王英
墨西哥古代文化略稿·····	宋伯胤

定价1.20元

略论汉代楚国(彭城国)

张祖颜

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徐州附近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汉墓,出土了数量可观的汉代文物和内容丰富的汉画像石。这些文物显示了汉代楚国和彭城国(下文只写楚国,包括彭城国时期在内)的兴盛。

考古工作者在这个地区发现的汉墓,给我们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探索汉代物质文明的资料。

《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全国设铁官四十多处,楚国彭城县和它的西邻沛县、东邻下邳都设有铁官,可见这个地区当时已有了较为发达的冶铁业。这里汉墓出土的铁器除少量的生活器具如铁鼎、铁灯以及一部分兵器外,数量和品类最多的是铁制工具,有犁、鍬、铲、锄、耙等农具和铤、锤、鍬、锥、斧、剪等手工具。表示它在农业和手工业等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得到较广泛的应用。

对出土的铁铤头、铁铤等作的金相分析表明,楚国的冶铁工艺具有相当高的水平。铁铤头表层用低温退火得到的“珠光体层”含炭0.7~0.8%,具有韧性。铁铤是铸造成型的生铁件在固体状态下氧化脱炭得到的高碳钢和中碳钢,其金相组织和近代钢相似。

在汉墓随葬物中,我们常常看到陶制的楼、屋、仓、磨、井、灶、猪圈等类冥器,有时一座墓中就大体备全了这类象征性的模型。汉代人崇丧厚葬,大凡能够搬动,墓中又能容纳得下的日用器皿、衣服、食品、装饰品、工艺品等都不惜代价地搬到墓中。不能或不易搬动,或墓中不易容纳的人间生活的必需设备,甚至猪、犬、鸡、鸭都做成模型随葬。这些模型组合在一起,象图画似地再现了当时地主和富裕农民家庭仓禀实、衣食足,猪豚满圈,鸡鸭成群的情景。

《禹贡》徐州条下所列特产有一种叫作“玄纁縞”的东西,可能是一种黑绸,史记货殖列传记述沂、泗流域宜于种植的是“五谷桑麻”。黑绸和桑麻作为这一带地方的主要产品和主要作物列入历史记录,这个地区的桑麻纺织已是有些名气了。这里的画像石中有三帧纺织图,一帧刻画的是豪富庄园中的纺织作坊,另两帧画面比较简单,刻的是普通农民家庭纺织的情形。从豪富到普通农民家庭都在纺织,可见这种手工业在楚国是相当普遍的了。

封建社会经济的兴盛和衰落,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上。但是,封建社会经济兴盛的最大获益者是地主阶级,经济愈繁荣,他们积聚和消耗的社会财富就愈多。这在墓葬中有明显的反映。他们的坟墓有的堆筑了大如山丘的封土,有的金镶玉裹随葬了许多珍贵器物,有的砌筑了坚固的墓室。

西汉楚国有十一个楚王,东汉有一个楚王、四个彭城王和一个未立名号的国君。他们的死葬耗费实在惊人。现在已知的在徐州市区内的土山墓就与彭城王有关。这个墓经过近两千年风雨冲击,仍有十八米高、底部直径七十米的大封土堆,这个封土下有两个墓室,

1969年群众掘开其中较小的一个，出土了约百件珍贵文物，其中银缕玉衣、鎏金兽形砚等已经驰名国内外。类似大墓徐州附近还有不少，仅楚王山下就有五座，据水经注记载，那是第一代楚王刘交和他的子孙们的坟墓。

大型汉墓出土的雕琢精细的玉器，胎壁极薄的漆器以及鎏金、错金、错银器等价值昂贵的陪葬品，其优美的造型，华丽的纹饰，科学的工艺作为一个时代文化的表现，使人惊叹。贵族豪富为他们的死丧消耗了巨大财富，因此而留下的文物使我们看到了楚国人民创造的辉煌的物质文明。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技艺的提高，楚国的建筑艺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汉墓中出土的陶楼、画像石上刻画的楼阁、桥梁等使我们看到了当时建筑物的具体形象。陶楼一般是两层，挑角重檐。画像石上有不少贵族庄园的宏伟画面，庄园前双阙巍峨，园内楼宇栉比，为蔚壮观。

社会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对文化艺术有了更高的需求，社会也有较多的余力从事文化艺术创造。汉画像石上刻画的舞蹈、化装成各种动物形象的百戏以及杂技掷丸、吐火、爬竿等画面，表现了当时比较丰富的文化活动。据记载，杂技和舞乐百戏在汉代社会中相当流行。这种生活享受，大多限于社会上层，画像石比较真实地纪录了当时贵族豪富们“极视听之娱”的悠闲生活。

画像石本是墓中的石刻，它是随着墓葬建造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东汉时期盛行在规模巨大的石室墓的门扉、门楣、墓壁上雕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的线刻和浮雕。从刻石的巨大规模和成熟的雕刻技巧分析，当时确有一批终生从事这种艺术生涯的石刻家。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低，却创造了不朽的作品，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

徐州历史上有两大灾害，一曰战事，一曰黄水。因为地理位置适中，徐州一向以战略城市著名，战祸较多。因为地处山东丘陵南缘，地势低洼，常受黄水侵袭。有文字记载以来，战争黄水交相为害，造成了这个地区长期停滞的局面。那么汉代楚国为何兴盛呢？原因可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考察。

我国黄河自黄土高原携带大量泥沙东流进入华北平原后，不断淤填抬高河床，不断决堤泛滥。但黄河在十二世纪末夺泗入淮改道流经徐州以前，其主流大体上是经华北平原流入渤海的，两汉时楚国受到的侵扰较少，这里原有的水系、地貌都未受到严重破坏。当时，源出山东丘陵的泗水自北而南纵贯楚国全境，汴水自西流来，到彭城与泗水会合，给楚国以灌溉和舟楫之利。

泗水两岸是它本身冲积起来的肥沃土地。《周礼·职方氏》记载这里“谷宜稻麦”，是仅次于长江流域荆扬二州的产稻区。1972年在徐州市郊奎山发现的西汉墓中存有完整的稻种给这些记载提供了佐证。水稻是高产作物，在人口兴旺的楚国种植具有重要意义。就地形推测，当时这里有水稻和旱粮的间作区，河谷洼地种稻，丘阜坡地种旱粮。

《禹贡》记载这里的水上交通说：“浮于淮泗达于河”。春秋战国以来，这里就是联系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的水上枢纽。两汉时代经这里运输的货物主要是汉王朝在江淮流域征收的粮食，“其运输量，在汉高祖时约数十万石，到汉武帝时已增加为六百万石之多”。参加运输的士卒多达六万人。除漕粮外，长江流域的其他物资也要经由这条水道运往京师。

楚国兴盛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因素。刘邦战胜项羽以后，战争逐渐减少，西汉社会基

本保持了约二百年的安定。东汉也有一百多年的安定。社会安定使楚国农民有可能利用较好的自然条件发展生产。西汉前期，汉王朝接受秦时“天下愁怨，溃而叛之”的教训，行所谓“宽仁”之政，使动荡的社会安定下来，逃亡的人重返家园，恢复了生产。文景时期统治集团进一步减轻徭赋，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人给家足的好景象，史称文景之治，在这个时期内，虽然楚王刘戊参加了那个“七王之乱”，在楚国以西不远处发生过一场战争，但是战争以刘濞、刘戊的迅速失败而告结束，并未造成多大破坏，楚国社会受的影响不大。武帝时，社会财富逐渐丰厚，强宗豪右兼并土地，田宅逾制的情况日益严重，加上他“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弄的天下虚耗，社会矛盾增加，出现了动荡。武帝感到形势不妙。“悔征伐之事”，改变做法，以力农为务。昭、宣时期继续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使西汉政权延续了较长时间。东汉前期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两汉统治集团因此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政权，农民也因之有了一线生路，社会生产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汉代自耕农是农业生产的主力。自耕农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者，是封建社会的主体，他们自耕自种，终年辛劳，冀图缴纳租赋以后多得一点剩余，以求温饱。睢宁双沟出土的汉画像石中有一幅牛耕图，图中刻画了两牛拉一犁，一人扶犁耕地，后随一人播种，稍远处一人举锄地耨，地头停放一辆运肥大车，一头家犬悠闲地躺在车旁，还有一位妇女，挑来一壶一簞。这幅石刻描写了一个家庭耕种的实际情形，这家有牛有车，看来是个比较富裕的自耕农。青山泉和古留城附近发现的两块刻有纺织的画像石。两幅画面近似。画面左侧刻一织机，机上妇女回身接过机旁妇女手中的婴儿，她实在辛劳。只好在机上稍停片刻给孩子喂奶，画面右侧还有一妇女在纺线。这两幅石刻描写的是普通农民家纺织的情景，也应是自耕农家庭。汉代对这种自耕农的生产相当重视，采取了不少措施“导民”劝民“力田”。认为“农，天下之大本也”。

以一家一户为单元的小生产，适应于当时主要使用人力，部分使用畜力的生产力的水平。自耕农家庭为了一家人的衣食、附着在小块土地上，男女老少各尽其力发挥了最大的能量。这就是楚国得以兴盛，贵族、豪富得以修筑巨大坟墓，埋下许多珍贵器物的主要原因。

楚国和彭城国是随着两汉社会矛盾激化、汉王朝败亡而衰落的。

东汉末年，徐州一带受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趁汉王朝政权没落而崛起的军阀曹操、吕布、刘备、袁术等为了争夺徐州刺史部，在这一带地方连续发动战争，从初平四年（193）曹操攻击陶谦开始，到建安五年曹操最后占领徐州刺史部才告结束。连续八年战争，彭城国和附近郡县两汉四百年来积累的社会财富破坏殆尽，人民大部分被杀、逃亡或被征发，彭城成了一片焦土。

两汉时代楚国人民曾以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创造了兴盛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对创造我国古老的物质文明作出过贡献。

试谈汉画像石起源

王 黎 琳

汉代画像石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它是刻在墓室石壁上的装饰画，题材往往是写实的，反映着汉代社会中的风俗制度。它对史籍是有力的佐证和补充。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在全国分布范围较广，可见画像石是汉代兴盛的一种艺术形式。为什么汉代盛行这种画像石墓呢？它是怎样逐步出现和发展的呢？我们认为它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综合产物，探索画像石的起源及其产生的历史原因，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产生画像石的社会背景：

汉画像石作为一种石刻艺术，它首先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西汉初期，为了改变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和楚汉战争给社会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的衰败局面，封建统治阶级制定了一系列比较现实的措施，采取了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使社会经济得以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武帝时由于颁行了“推恩令”和“附益阿党”之法，在政治上基本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割据的局面，加强了封建统治、并通过推行铸钱、盐、铁官营，确立和巩固了封建生产关系、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教有利的条件，从而使社会达到了空前鼎盛的时期，当时全国出现了很多政治、经济、文化比较繁荣的地区。画像石墓出土较多的陕北、晋西、四川、河南、山东、苏北等地，当时都是比较富庶的。

随着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皇亲贵戚、地主、富商开始拼命兼并土地、扩大势力。到西汉晚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东汉时更是愈演愈烈，逐步形成了役使大量农民的大土地所有制的豪强地主庄园经济。这些豪强地主财多势大，盘剥人民，生活侈靡。《史记·平准书》提到：“宗室有土，公卿以下，争于奢侈，室庐与服僭于上，无限度”。《汉书·地理志》也提到：“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仿）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这说明当时的豪强之家，生前姿情享乐，死后则崇丧厚葬。

随着经济的发展，两汉时期厚葬之风十分盛行，封建统治阶级为满足自己的奢望，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营造各种类型的墓葬，陪葬大批珍贵的器物，如《盐铁论·散不足篇》所说“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当时这种厚葬之风不仅在皇亲、贵戚、大豪强、大地主中流行，一些中、小地主以及众多庶民也受其影响，竞相仿效。因此，目前所发现的两汉时期各种类型的大、小墓葬特别多。厚葬之风盛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统治阶级所推崇和提倡的儒学中的孝悌思想。两汉时期孝悌思想倍受重视，东汉时更甚，在当时的

任官制度中重要的一条是“举孝廉”。孝悌的突出表现就是厚葬，当时很多人通过厚葬来博取孝悌之名。画像石墓便是随着这种厚葬之风的盛行，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

汉代人为什么要在墓室的石壁上雕刻画像呢？画像石的题材和内容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于当时社会流行的封建迷信思想是分不开的，它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反映。

地主阶级生前过着豪华的生活，并爱夸耀豪富，他们认为“崇高莫大于富贵”，活着是如此，死后也幻想着灵魂不死，继续享乐。因此，画像石中多有大肆渲染他们富贵生活的场面，如重楼高阁、车马出行、宴饮歌舞、田猎游幸等。

汉代统治阶级好名之风甚盛，爱把自己所崇拜敬仰的历史事件、人物、传说刻入墓中以训诫自己和后人，在画像石中这类题材也是比较多的。

另外，当时社会所宣扬的神仙思想和经纬迷信学说对画像石题材及内容的影响是很大的。汉武帝时，神仙方术之风十分盛行。方术士宣扬什么“寡欲养性保”“神养真”或“服不死之药”达到“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神仙思想。升天成仙是当时统治阶级所向往和追求的，这些在汉代墓葬中多有反映，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它的主题就是“引魂升天”，在帛画上部绘有象征天上境界的内容。河南洛阳卜千秋墓中的壁画也绘有太阳、月亮、男女墓主人乘龙、乘三头鸟升天的形象。画像石上也多刻有羽人，东王公、西王母、玉兔捣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乘龙驾云的仙人等反映升天思想的画面。

西汉末年，以阴阳五行，祲祥灾异为中心思想的经纬迷信学说流行起来，为了迎合封建阶级统治的政治需要，许多官僚、儒生随心所欲地编造一些奇异、怪诞的谣言，谎报所谓祥瑞。《后汉书》各帝纪中都有关于祥瑞的记载。这种现象也必然要反映到墓葬中去，几乎每个画像石墓都刻有龙凤、麒麟、福德羊、九尾狐、九头兽等表示祥瑞的珍禽异兽。

画像石墓以及画像石的题材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

二、从墓葬形制的发展上探其起源

西汉初期，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基本上仍沿用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棺槨，礼器制度。武帝以后丧葬习俗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冲破了旧传统礼制的束缚，具有了别开生面的作风。墓葬形制也随之发生了大的变化，出现了各类不同的墓葬，如砖室墓、石室墓、砖石结构墓，崖洞墓、石槨墓等等。当然，各地的墓葬形制是不同的，这与当地自然条件不同有很大关系，如木槨墓的出现是以适应做棺槨的梓木、楠木生长较多的湖南、湖北地区为主。中原一带多盛行空心砖墓，如陕西和河南的部分地区，大概是因为这些地区缺石，缺木。而山多石多的鲁中南，江苏北部，河南南阳及四川一些地区则多见崖洞墓、石槨墓、石室墓和砖石结构墓等。

画像石墓应该说是起源于石室墓和石槨墓。最初的石室墓和石槨墓是不施雕刻的。先就石室墓来讲，最初的石室墓形制基本上是以象征地面建筑的多室为主，有时是砖石并用，但墓中很少见有雕刻。到西汉中、后期便开始出现了在石室墓中施绘刻画的萌芽，如1975年在南阳东郊赵营砖瓦厂发现的汉画像石墓，其墓制比较原始，由大门、前室、两主室，两侧室组成，券顶用汉武帝时期流行的子母樨大砖构筑、画像较少、内容单调一律，仅门扉和门柱用阴线刻画楼阁门阙、所有画像皆施用朱彩描绘。从墓葬结构、出土器物 and 货币

看,该墓的建造年代应在西汉中期。在目前发现的画像石墓中,它的年代是较早的,墓中画像石带有明显的早期特征。从画面施以彩绘来看,还没有脱离壁画对它的影响,这是最初在石室墓里出现的雕刻,以后逐步发展完善,出现了刻画成熟的画像石墓。

画像石墓起源于石槨墓在徐州地区是比较明显的。徐州地区在西汉早期开始出现石槨墓,最初的石槨墓是就山体向下凿成长方形竖井,然后收缩成类似石椁的墓室,上盖一石板而成,在徐州市郊小山子发现的西汉中期的石椁墓是用石板扣合而成的,这时石椁墓的椁板上没有刻画。到了西汉晚期,石椁墓是在墓圹内填放石椁,其作法使用了榫扣,这时的石椁墓便开始在椁板上出现刻画,这些刻画往往是极简单的,如徐州市郊万寨墓出土的石椁壁上的刻画用简单的线条刻出了房屋的轮廓和个别几何图案。东汉初期石椁墓的形制基本上如西汉晚期,但墓圹内出现了两个或三个椁室,椁板上的画像墓比西汉晚期的画像要复杂的多,内容大大增加,如沛县栖山出土的石椁墓、石板的两面和前、后挡都有刻画,内容也出现了舞乐,日常生活、车马出行,神话传说等,但这时的画像刻技古拙,造型不够准确,表现出早期刻画的特证。如果把西汉晚期和东汉初期画像石上所刻的房屋和边饰纹等加以比较的话,可以明显看出其发展关系。

石椁墓到东汉中期已不再出现,代之而起的是大、小不等的多室画像石墓,这些墓中大部分带有侧室或回廊。因石椁墓已不能适应愈来愈盛行的厚葬风气,所以被多室的画像石墓所代替。这时的雕刻风格和反映的内容也逐步地成熟和完善,成为画像石墓的鼎盛时期。

三、汉画像石的艺术渊源

画像石是一种石刻艺术,是刻在石头上的画,它和我国古老的绘画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从画像石雕刻的艺术风格来看,主要是运用了我国绘画中传统的以线条为主的表现手法,以及富有装饰性等特点。就我国可以追溯的绘画历史——即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彩陶上所绘的图案,就已充分表现出了这些特征,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图案是用简单的线条将自然界的现象和生物图案化,装饰于器皿上,这可以说是我国早期绘画的起源。

这种绘画传统发展到战国时便出现了壁画、帛画和铜器上的装饰,这时从题材到构图风格就更加接近汉画像石,以长沙东南郊陈家大山楚墓中出土的《人物夔凤帛画》而论,这幅帛画是以线为主要造型手段,帛画上人物、动物的形象线条单纯,具有装饰的趣味,这与徐州地区早期石椁壁上的线刻画像以及河南扬官寺墓内所刻的画像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另外,战国时期的狩猎画像铜壶,辉县出土的水陆攻战铜鉴上的装饰画,如果将它们与东汉时期的剔地浅浮雕的画像石相比较,其题材,构图和描写人物的手法都有着较密切的因袭关系。可以说,画像石是在我国古代绘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继承并发展了前代绘画的优秀传统,它与早期绘画相比只是画面质地不同,作为中国绘画的特点,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在墓壁上刻画与自春秋战国以来盛行的壁画艺术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国壁画的历史十分悠久,春秋时的墨翟就曾谈到殷商时的“宫墙文画”。战国诗人屈原、看了楚先王庙里的壁画写出了“天问”。到了秦汉时壁画更加流行,已经成了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的

宫墙、庙宇、祠堂多有所绘，其壁画的题材主要是迎合当时统治阶级升仙、迷信、好名、享乐等思想的，它在封建教化上起了重要作用，很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推崇。随着厚葬之风的盛行，壁画又被搬入坟墓。同样，画像石墓的出现，也是在原石室墓，石椁墓的基础上，随着雕刻风气的兴起，将原先反映在地面建筑上的壁画，用石刻的形式反映在墓内的石壁上。如南阳市东郊赵砦砖瓦厂发现的西汉中期画像石，画像上皆以朱彩描绘，这就说明产生于萌芽时期的早期画像还没有完全脱离壁画的作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画像石作为雕刻艺术有着它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发展过程。它最初的出现应是简单的线雕，这主要是继承早期绘画的传统，如徐州地区发现的早期画像石都为线雕。目前发现一块较早的带纪年的画像石——山东沂水鲍家山昭帝元凤年间（公元前80——前75年）的凤凰画像，即为简单的线雕。随着石刻艺术的发展，画像石逐步由简单的线雕、发展为减地的浮雕，但这个时期纯线雕的作品，并没有因为浮雕的出现而绝迹，它也在不断发展，从早期古拙、质朴的基础上逐渐的完美成熟，后期线雕画像的特点细腻真切，线条流畅，画面生动活泼，如邳县燕子埠墓和山东沂南墓中石刻画像就属于此种。而浮雕则是先刻出轮廓并剔地、然后在突出的轮廓内用较多的阴线表示细部，使画面具有立体感。从这可以看出浮雕是在简单线雕的基础上发展的，但同时线雕也在发展，到东汉中期、后期它们在墓葬中都出现过，如徐州地区两座带纪年的画像石墓，即邳县燕子埠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画像石墓和铜山县茅村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画像石墓。在这两座墓中，燕子埠画像石为比较成熟的线雕、茅村画像石为比较成熟的浅浮雕，这两座墓的年代是接近的。由此看出在这个时候的线雕、浮雕只是雕刻技法的不同，不再存在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无论线雕、浮雕都承袭并发展了以线条表示形象，并富有装饰这一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特征。

汉画像石如同任何事物一样有着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下面简单的谈谈汉画像石墓的下限问题。

关于画像石墓的下限，根据目前从地下发掘的材料来看，应是在汉末三国时期。

东汉末年，由于土地兼并以及统治阶级对人民愈来愈黑暗的统治，使得人民生活极端困苦，贫者无立锥之地，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黄巾起义，据史书记载：“旬日之间，天下响应。”可见其影响范围是相当大的。在画像石分布较多的南阳地区，当时是前期黄巾军活动中心之一，山东青州、兖州、徐州地区是后期黄巾军活动的重要地区。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豪强势力，使他们无力再去继续那种厚葬习俗，去营造浪费人力物力的画像石墓。

到汉末三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不断，持续了大约半个世纪，使整个社会经济凋敝，土地荒芜，人口大减。由于经济的残破和基于社会的不稳定，曹操等人十分反对厚葬习俗，他认为“厚葬繁而无道，俗又过之。”曾立“禁厚葬”之令，违者绳之以法。他死前下遗令要“葬於瘠薄之地”“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故“自制终亡衣服四匝而已”。由于推行了禁厚葬令，厚葬之风被坚决制止，就目前考古发掘材料来看，这一时期的墓葬是比较少的，画像石墓也不可能继续存在。可以说画像石墓是汉代社会的特殊产物，它随着汉朝的兴盛而兴起，也随着汉朝社会的灭亡而终止。

江苏徐州的崖墓

武立华

崖墓，俗称“蛮洞”，是我国西南地区四川一带常见的一种墓葬形制。以往中原一带发现甚少。一九七二年南京博物院在铜山县小龟山发现一座崖墓，为江苏省的首次发现。其后我们又相继清理一些这类墓葬，取得一些完整的资料。本文试图通过近几年的考古材料，对徐州崖墓的时代、分期，及其发展继承关系，做一些探讨。

一、形制及其分布

崖墓的建造方法，简单的说，就是穿凿山岩做墓，因此也可以称为岩墓。其种类可看做竖井式、洞室和多室三类。后二类，是由竖井式墓葬的壁龛进化而成，它同中原地区墓葬形制由土坑墓发展向土洞墓过程是一样的，只不过一种建在山上、一种建在平地而已。

任何一种墓葬形制的产生都与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密切的联系。徐州市周围“冈岭四合”，大面积的石灰岩侵蚀残丘，环绕徐州城廓。四面青山，正是地主贵族、达官贵人穿山为墓，以石代椁的好风水地，石灰岩较花岗岩岩性软，又有大小不同的裂隙溶洞可以利用，便于凿刻。加之徐州当时冶铁业发达，为营造崖墓提供了绝好的物质条件。因而，汉代崖墓在徐州一带风靡一时，成为西汉时期的一种主要墓葬形式，分布在以今徐州市为中心的四周山岑上，基本上没有超过当时楚国所辖范围。

二、分类

近几年清理的三十余座崖墓，可分作三种类型，即竖井式，洞室和多室。

竖井式崖墓。共十余座，分三式：

I式：它的建造方法是在山岩上垂直向下凿成竖井，基底凿成石椁形状的椁室。椁室上凿留台面以便承受盖板。石板一般厚15~20厘米，四块横铺，上面填土分层夯实。椁室内，有的用长条石隔分为棺室和边箱两部分，有的不作分隔。这一式的崖墓如金顶山M1、M2；金顶山在徐州市南五公里、海拔标高80米。两座墓建造在山巅处，形制相同。M1被盗。M2深7长3、宽2米，距基底1.10米处留三级台面，上置盖板四块，用红色粘土分层夯实。墓南北向，存木棺漆痕。随葬品十五件，鼎二、盒二、壶二、钫二、茧形壶二，匝、盘、盂各一件、皆泥质灰陶，上有彩绘。铜镜一面，弦纽。文帝时“半两”钱四枚，随葬品都放置棺外南端。该墓年代约在汉文帝时期。